

“通史家风”与章学诚的通史思想

王记录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 要想准确理解章学诚“通史家风”的内涵,“通”和“家”这两个概念缺一不可。“通史家风”之“通”,既有编纂学意义上的“纵通”和“会通”,也有思想层面上的“通识”和“变通”;“通史家风”之“家”,以“家学”为中心考察史学宗旨之承变,从“家学”到“《春秋》家学”再到成一家之言的“通史家风”,建立了“通史家风”与“《春秋》家学”之间的精神联系。章学诚还比较了“通史”“集史”“断代史”的差异,认为三者“家法”不同,宗旨有别,将似通而非通的史著排除在通史之外。章学诚认为,“专家之学”和“别识心裁”是通史撰作的最高境界,“别识心裁”既体现在体例上,又体现在史义上。以“通”论“家”,“家”因“通”而明源流;以“家”衡“通”,“通”因“家”而分类例,这是章学诚通史思想的最大特点。

[关键词] 清代 章学诚 通史家风 家学 通史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332(2022) 04-0048-13

“通史家风”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申郑》中提出的重要学术命题,并据此阐述了自己的通史思想。关于“通史家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以章学诚的命题为引子,提出今人对“通史家风”的理解^①。至于章学诚“通史家风”的意蕴究竟是什么,其通史思想又是什么,并没有回到章学诚的语境中进行认真梳理。

一、“通”与“家”：“通史家风”的意蕴

章学诚的“通史家风”,最关键的是两个概念:“通”和“家”。以往的研究,很重视“通史家风”之“通”^②,而忽略了“通史家风”之“家”。事实上,忽略了“家”,就无法探知“通史家风”的全貌。只有把“通”与“家”联系起来,才能全面理解“通史家风”的意蕴。

(一)“通史家风”之“通”

章学诚重“通”,他的两部著作《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均以“通”命名。他还在《文史通义》中辟《释通》《横通》等篇章,专门讨论“通”和“通史”。“通”是章学诚最感兴趣的学术话题之一。他说:“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可不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有高下、偏全、

[收稿日期] 2022-05-15

[作者简介] 王记录,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

[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资治通鉴》研究”(项目编号:2022-JCZD-14)阶段性成果。

① 如许凌云《试论“通史家风”》,《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吴海兰《整体思维视域下的“通史家风”》,《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② 瞿林东:《论“通史家风”旨在于“通”》,《史学月刊》2018年第7期。

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①章学诚所谓“通”,有两层含义:一是具象意义上的“通”,就像道路一样四通八达而无所不至;二是抽象意义上的“通”,犹如人的见识,虽有高下偏全之差异,只要能达于“道”,亦谓之通。可见,章学诚所揭示的“通”,有显性和隐性两层意义,具体到“通史家风”之“通”的意蕴,他也是在编纂学(显性)和学识(隐性)两个层面上展开讨论的。

在章学诚眼里,编纂学意义上的“通史”之“通”具有“纵通”“会通”的特点,强调通史编纂的“时贯古今”与“会通四部”。

刘家和先生曾指出:“‘通’字本来是指空间意义上的由此及彼,而空间上的往来不穷又是在时间里进行的,因而也就变成了时间上的连续不断。‘通’字用之于在时间中运行的历史,于是‘通史’之‘通’,主要即指时间上的连续而言。”^②章学诚以道路之空间上的四通八达而引出对“通史”时贯古今的认识,他说:“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则义例所通,则不嫌合撰。”^③又说:“通史远自古初,及乎作者之世。”^④他特别指出司马迁作《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⑤,杜佑作《通典》“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⑥。所谓“上下千年”“远自古初”“通古今之变”,都是指时间上的“纵通”,即时贯古今。章学诚继承了司马迁、杜佑、司马光等前代通史家“贯通古今”的思想,将“通史”看作是一个时间上连续的整体。西方“普世史”重在“共时性的空间之纬”,中国“通史”重在“历时性的时间之经”^⑦,揆诸章学诚的论述,这样的总结无疑是非常准确的。

章学诚的“通史”之“通”还有“会通”一切文献之义。章学诚指出,《史记》除了在时间上贯通古今外,还广涉四部。他盛赞郑樵“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而作《通志》,并遥接郑樵“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⑧的会通思想,在讨论通史撰述时,极力赞赏“会通”的作法;杜佑作《通典》“统前史之书志”,裴潏作《太和通选》“汇公私之述作”,司马光作《通鉴》“合纪传之互文”,郑樵作《通志》“总古今之学术”^⑨。所谓“统”“汇”“合”“总”,均有会通四部之含义。在章学诚心目中,四部之书均“相出入”且“相资为用”^⑩。章氏认为,作“通史”要能“会通”一切文献,网罗百家,才能展现“通史”之“通”的魅力。

学识意义上的“通史”之“通”具有“圆神”“变通”的特点,更多地强调通史撰述的“通识”。

章学诚曾用“圆神”“方智”两个概念来解读中国史学,指出“圆而神”具有“神以知来”“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的特点,“方以智”具有“智以藏往”“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的特点^⑪。“圆神”与“方智”相较,“方智”比较好理解,而“圆神”总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整体感觉和“意味”^⑫。实际上,“圆神”的整体感觉和“意味”里蕴含一种“通识”。这种“通识”是个性化和体悟性的,用章学诚的话说就是“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⑬，“神而明之,存于其人,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人皆戛戛,我独有余”^⑭。抛却其中的神秘性不谈,“圆神”实际上就是要表达“通史”之“通”的“通识”境界,一种“通识”眼光下的通史撰述的“悟性”。章学诚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横通》,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

② 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41页。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考摘录》,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59页。

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2页。

⑥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中》,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8页。

⑦ 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⑧ 郑樵:《通志二十略》,通志总序,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⑨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37页。

⑩ 章学诚:《校雠通义》卷1,《互著》,见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⑪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6-39页。

⑫ 章益国:《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97-202页。

⑬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9,《又与正甫论文》,见《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

⑭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0-71页。

重视“识”，他认为词章、考订、义理分别对应才、学、识，词章主于才，考订主于学，义理主于识，而才、学、识又对应作性、记性和悟性，“作性扩而成才”“记性积而成学”“悟性达而为识”^①。“识”需要“悟性”，而“悟性”具有个体性，可意会不可言传。通史撰述要达于“圆神”，就需要有“通识”及“通识”之下的“悟性”，即思维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没有“通识”，是难以达到“圆神”的。章学诚说：“神以知来，学者之才识是也；知以藏往，学者之记诵是也。才识类火日之外景，记诵类金水之内景……金水能受火日之光，而火日不能受金水之光也。”^②笔者以为，此“才识”蕴含“通识”之意。“神以知来之才识”彰显作者的“通识”，像太阳（火日）之光芒；“智以藏往之记诵”像金星、水星（金水）之内敛，太阳可以照亮金星、水星，反之则不可能。“通识”之重要，于此可见一斑。章学诚批评那些名通而实不通的史著，貌似汇合所有资料，上下左右贯通，实际上只是“摘比分标，不相联合”，缺乏“通识”，没有形成浑然一体的知识体系，“识乏通材，遂使书同胥史矣”^③。“识乏通材”对于通史撰述的伤害是致命的。

“变通”也是章学诚“通史家风”的重要思想遗产。章学诚数言“唐后史学绝”^④，“史学至唐而尽失”^⑤。因为在他看来，唐以后作史，“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⑥。章学诚认为作史贵在“变通”，他以《易》之变易提倡“史学通识”^⑦，屡次批评唐以后史学僵化，“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面对唐宋以来史学僵化的局面，章学诚大声疾呼要“思所以变通之道”^⑧！他指出《史记》作为通史，具有“圆神”的特点，但后世作通史者不知变通，将司马迁的“通识”彻底湮没，“迁书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后世袭用纪传成法，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方不可智”^⑨。他赞扬郑樵作《通志》，就是因为郑樵能够变通通史义例，自成一家，所谓“变通亘古以来，合为一家纪载”^⑩。章学诚主张作通史必须“拟神”，不能拘守成法，要“贵得其概而有以变通之”。他指出，只有变通，才可能化腐朽为神奇，扭转史书编纂僵化的局面。章氏指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系改司马光《通鉴》而来，本无神奇之处，就是因为“穷变通久自有其会”，才使之成为史学史上的杰作，“《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题，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⑪。“穷变通久”成为章学诚“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的思想支柱。

要之，显性（编纂学）意义上的“通史”之“通”与隐性（学识）意义上的“通史”之“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显性意义上的“时贯古今”和“会通四部”只有借助隐性意义上的“圆神”和“变通”才能成就章学诚所理解的“通史”。没有“通识”的通史编纂，只能是数千年历史的资料汇编，难以构成有内在联系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

（二）“通史家风”之“家”

美国学者倪德卫认为“家”是章学诚的核心概念之一，并认为“‘家学’概念与章学诚的史学概念最为密切”^⑫。章学诚数言“家学”“家法”“一家之言”等，并提出“通史家风”。那么，“通史家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答沈枫堦论学》，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3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六，《杂说》，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52页。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41页。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3页。

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论修史籍考要略》，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34页。

⑥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3页。

⑦ 吴怀祺：《章学诚的易学与史学》，《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⑧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7-38页。

⑨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71页。

⑩ 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卷3，《丙辰札记》，见《章学诚遗书》，第391页。

⑪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71-672页。

⑫ 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1738—1801）》，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风”之“家”与“家学”“家法”“一家之言”等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此为全面理解章学诚“通史家风”意旨的关键。

章学诚所言“家学”，来源于他对先秦学术发展的认知。章学诚指出，三代“学在官府”，官吏掌握图书并传授其学。因“官守学业合一”，“以吏为师”成为学术传授的常态，“六艺”皆有官师传习^①。及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天子大权旁落，官守学术的局面被打破，“官师治教分离”，私学兴起，学术传承出现了从“王官之学”向“百家之言”的转变。三代时期“即官守而存师法”的局面被春秋战国时期“人自为书，家自为说”的局面所代替，“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②，于是“自树一家之学也”^③的“家学”兴起。章学诚的“家学”从“官师合一”的“官学”演变而来，所指乃三代“官学”散裂、私家学术兴起后的新的学术传统。

从“家学”出发，章学诚将史学“家法”追溯到孔子作《春秋》，并数言“《春秋》家学”。所谓“史学本于《春秋》”^④，“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学也”^⑤，“陆贾、史迁诸书，刘、班部于《春秋》家学，得其本矣”^⑥，不一而足。章学诚之所以将史家之学追溯到《春秋》，并提出“《春秋》家学”，是因为在他看来，《春秋》“属官师、政教分途之后的第一部私家史学著述”，“为专家史学之祖”^⑦。章学诚将《春秋》看作是史学的源头，并以“《春秋》家学”概括之，目的是辨章史学精神，考镜史学源流。

章学诚说：“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⑧由此出发，他考察了中国史学史上能绍法“《春秋》家学”而“自成一家之言”的史家，认为司马迁、班固等人能当其任。章氏指出，古代史家纪事，“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而继承《春秋》“属辞比事”的代表就是司马迁和班固，其“家学渊源，甚于汉廷经师之授受。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纬六经，缀道纲，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学，递相祖述”^⑨。“迁、固之书本绍《春秋》之学”^⑩。在章学诚看来，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通史和以班固《汉书》为代表的断代史，都是继承《春秋》属辞比事之学的杰作。但是，他更注意区分二者在史学宗旨上的差异。在章学诚看来，“家学”所追究的是学术内在精神的传承，而非形式上的类别或归属。比如，人们通常将《史记》《汉书》都看成是纪传体之宗。章学诚却认为，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讲，《史记》的“家法”是通史，开创了通史的学术传统，《汉书》的“家法”是断代为书，开创了断代史的传统。“谈、迁、彪、固，并称世史，而彪、固实与谈、迁不同。谈、迁同为通史，而班氏则彪亦通史家学，故《后传》依附百三十篇……至班固乃始确然以断代为书……遂为后代不祧之祖，而通史之业微矣。辨家学者，不容不知其义也”^⑪。在章学诚看来，中国史学史上“通史”和“断代”两大传统，均可追溯到“《春秋》家学”，但又各有“家法”，只有辨其“家学”，才能明其学术统绪和学术精神之差异。

章学诚认为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与孔子的“《春秋》家学”关系极为密切。所谓“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

① 章学诚：《校雠通义》卷1，《原道》，见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第2-3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经解上》，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6页。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下》，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7页。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立言有本》，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58页。

⑤ 章学诚：《校雠通义》卷1，《宗刘》，见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第8页。

⑥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考释例》，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39页。

⑦ 周启荣：《史学经世：试论章学诚〈文史通义〉独缺〈春秋教〉的问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8期，1990年6月。

⑧ 章学诚：《校雠通义》卷1，《互著》，见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第15页。

⑨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上朱大司马论文》，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67页。

⑩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经解下》，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8页。

⑪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考摘要》，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57页。

《春秋》家学耳”^①。“通史仿于史迁，自是一家著作，溯源《春秋》，其间多有法外之意，可意会而不可言传”^②。凡此等等，意在揭示司马迁以卓见绝识，创例发凡而作《史记》是绍述“《春秋》家学”。也就是说，《史记》“成一家之言”的“通史家法”与孔子的“《春秋》家学”一脉相承，是“继《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③。换言之，司马迁继承“《春秋》家学”，开创通史编纂的史学传统，形成了“通史家风”。南宋郑樵“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绍述司马迁的通史思想，撰述《通志》，所谓“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章学诚极力称颂郑樵，就在于郑氏继承了“通史家风”，能够“创条发例，巨制宏编，即以义类明其家学”^④。很显然，章学诚认为，从孔子的“《春秋》家学”，到司马迁的“通史家风”，再到郑樵对“通史家风”的继承和发扬，一以贯之。“《春秋》家学，递相祖述”，史学才有了活泼泼的生命力。可见，不懂“家学”“家法”“家风”之间的关系，就不好理解“通史家风”的旨趣。

章学诚认为，《春秋》事、文、义三者之间，“义意为圣人所独裁”^⑤，蕴含了孔子的思想，这是“《春秋》家学”的首要内容。对于《春秋》之“义”与通史撰述的关系，章学诚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而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⑥。这段话内涵丰富：经世层面上，“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撰述层面上，体例灵活，“独断于一心”“成一家之言”。章学诚所极力倡导的“《春秋》家学”，其“义”就在于此！而这也正是“通史家法”所在，是司马迁、郑樵所遵循的作史原则。

总之，章学诚抓住“家”这个核心概念，由“家学”而“《春秋》家学”，由“《春秋》家学”而司马迁的“一家之言”，由“一家之言”而“通史家风”，将“通史家风”与“《春秋》家学”贯通，使古今史学建立了“精神之间的直接联系”^⑦。“通史家风”之“家”，就是通史撰述的学术传统和精神承续。

二、“通史”“断代”与“集史”：通史的特性

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通过比较研究，细致区分了“通史”与“断代史”“集史”的源流、类别和宗旨，进一步彰显通史的特性。

（一）“通史”“断代”“集史”的差异

在讨论通史和断代问题时，章学诚敏锐地发现，在通史与断代之间还有一种既非通史、亦非断代的“断取数代之书”——“集史”。譬如李延寿的《南北史》，刘知幾在《史通·六家》中将其归为《史记》“通史家”，所谓“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皆《史记》之流也”^⑧。对此，章学诚提出异议：“刘知幾六家分史，未为笃论。《史记》家，自是通史……至李氏《南北史》乃是集史，并非通史……刘氏牵合为一，非其质矣。”^⑨他重新区分类例，指出“马迁乃通史也，梁武《通史》、郑樵《通志》之类属之。班固断代专门之书也，华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49-250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考摘录》，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58页。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黜陋》，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81页。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49页。

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四，《〈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31页。

⑥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2页。

⑦ 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1738—1801）》，第145页。

⑧ 刘知幾：《史通》内篇，《六家》，赵吕甫《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⑨ 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卷3，《丙辰札记》，见《章学诚遗书》，第389页。

(峤)、谢(沈)、范(晔)、沈(约)诸家属之……《南北史》断取数代之书也,欧、薛《五代》诸史属之”^①。“若李延寿《南北史》,乃是汇辑沈、萧、姚、李等八家之书,整齐纪传,使不杂乱,其例自有断限,当入集史,不可入通史”^②。

对于“通史”和“断代”旨趣的差异,章学诚进行了细致区分。他以《史记》《汉书》为例指出,从形式上看,二者都是纪传体,但从谋篇布局到著史宗旨,“通史家学”与“断代之祖”都存在极大差异,“《史记》为通史,《汉书》则断代为书,体固不侔”,“宗旨已不侔矣”^③。他用两两对比的方式来凸显通史与断代的不同,“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④。也就是说,以《史记》为代表的通史的特点是“圆而神”“通变化”“无定法”,而以《汉书》为代表的断代史的特点是“方以智”“守绳墨”“拘成法”。在“整齐故事与专门家学”^⑤之间,作为通史的《史记》是“专门家学”,作为断代史的《汉书》是“整齐故事”。

基于以上认识,章学诚进一步指出,司马迁创立通史,成一家之言,“其间多有法外之意,可意会不可言传。若在官修史书,不可行矣。故元、成之间,屡诏续补,而讫无足观。自班氏而后,断代之书递相祖述,师般不作,规矩可循,故至今相仍而不废也。”^⑥由于通史撰述“自是一家之言”“通变化而无定法”,有其独特的“法外之意”,属“专门之业,自具体要”^⑦,有一种对史学终极意义的领悟,难以遵循,需要创新,所以后世有成就的通史极少;而断代史“有规矩可循”“守绳墨而拘成法”,故而绳绳相继,因仍不断。在章学诚看来,作断代史易,作通史难。他之所以为郑樵辩护,就在于郑樵发扬了司马迁的通史精神,“心知其意”,迎难而上,“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⑧。郑樵《通志》所记史事与旧史没有什么不同,但他“有志乎求义”,终于成就不朽之史著,“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明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也”^⑨。

关于“通史”与“集史”旨趣的差异,章学诚也进行了论证。他说:“集史之书,体与通史相仿,而实有淄澠之分。通史远自古初,及乎作者之世,别出心裁,成其家学,前人纵有撰述,不复取以为资,如梁武不因史迁,郑樵不因梁武是也。集史则代有所限,合数代而称为一书,以继前人述作,为一家言,事与断代之史约略相似。而断代又各自为书,体例不一,集史则就其所有诸体而画一之,使不至于参差足矣,事取因人,义求整齐,与通史之别出心裁,无所资藉,断代之各自为书者,又各不同也。”^⑩这段话将“通史”“集史”“断代”放在一起比较,从时间断限看,“通史”自远古写到作者之世,“集史”则断取数代,“断代”乃一朝之史。从撰述形式看,“通史”不相因袭,“集史”继承前人述作,将诸体整齐划一,“断代”则“各自为书,体例不一”。从撰述思想看,通史“别识心裁,成其家学”,集史“事取因人,义求整齐”。总之,集史与通史貌合神离、貌同心异,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其与断代史则貌离神合、貌异心同,在性质上没有本质差异。

章学诚进一步比较了“通史”和“集史”的异同,他认为通史和集史在宗旨上“判若天渊”。“通史各出义例,变通亘古以来,合为一家纪载”,“集史虽合数朝,并非各溯太古,自为家学者可比”。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论修史籍考要略》,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32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考摘录》,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58页。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考摘录》,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53-457页。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6-37页。

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22页。

⑥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考摘录》,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58页。

⑦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40页。

⑧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49页。

⑨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40页。

⑩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考摘录》,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59-460页。

因为“通史各溯古初,必须判别家学,自为义例,方不嫌于并列,否则,诚不免于复沓之嫌矣。集史原有界画,李延寿行之于前,薛、欧行之于后,各为起讫,无所重复,虽一家凡例,两书可通用也。”^①在章学诚看来,通史各出义例,自为家学,不蹈袭前人;而集史则是断代史的集合,义例可以通用,内容各有起讫,可以因袭前人。集史记载数朝史事,囿于断代史局限,发凡起例不妨相同,宗旨问题尚不突出。而通史突破朝代局限,贯通古今,各通史的叙事内容大致相同,如果义例无别、宗旨不明,就会造成叙事重复,失去存在的价值。

在中国史学史上,上下贯通的著述在在多有,如果不加分别,很容易将这些著述与具有“别识心裁”的通史混为一谈,致使家法混淆,流别不明,不利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此,章学诚立足于著述宗旨,对那些貌似通史的史著,一一辨析其编纂义例,揭示这些史著的本质。梁武帝萧衍撰《通史》,上起三皇,下至南朝齐,章学诚认为“史籍标通,此滥觞也”,但同时指出该书“集众官修,知其必不能用专门著述之意也”^②,与司马迁、郑樵诸人倡导的通史观念“流别不同”。“至于高氏《小史》、姚氏《统史》之属,则撙节繁文,自就隐括者也。罗氏《路史》、邓氏《函史》之属,则自具别裁,成其家言者也。范氏《五代通录》、熊氏《九朝通略》,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李氏《南北史》,薛、欧《五代史》,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其余纪传故事之流,补辑纂录之策,纷然杂起,虽不能一律以绳,要皆仿萧梁《通史》之义,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别,不可不知也”^③。北魏元晖撰《科录》,摘录上古至南朝宋十四代史籍,以类相从,“则是类比之书,并无著作深意,当与《高氏小史》之类,并入史纂,不可以入通史”^④。在章学诚看来,像高峻《高氏小史》、姚康复《统史》、罗泌《路史》、邓元锡《函史》、范质《五代通录》、熊克《九朝通略》、李延寿《南北史》、薛居正《旧五代史》、欧阳修《新五代史》、元晖《科录》之类的史著,虽包罗数代甚至溯源上古,但或隐括节选,或自为体系,或比次纂录,“并无著作深意”,与司马迁、郑樵等人独具别识心裁、成一家之言的通史“宗旨有别也”。章学诚意在告诉人们,区分“通史”与否,不可仅从形式上判断,更要从宗旨上判断。

通过一系列的辨析,章学诚总结了“通史”的特性:“凡所谓通史者,不问记载短长,学问疏密,要有卓然独见,迥出前人,灼见前代成书,己意难以因袭,故舍置前史,独溯古初,以自成家。与节钞、类比、隐括诸书,相差虽似毫厘,而相去不啻千里。”^⑤在章学诚看来,通史的核心内涵是不因袭前人,有卓然独见,自成一家。所谓“不问记载长短”,并非否定通史在时间上的自古至今,而是要说明朝代上的打通还不能就称为“通史”,那些包罗几个朝代的史书,因无“别识心裁”,是似通而实不通的“集史”。在章学诚这里,有了时间上的上下贯通,没有卓识独见,无法自成一家,是不能称为“通史”的。

(二) 通史的“六便”“二长”“三弊”

章学诚比较了通史、集史和断代史的差异后,提出通史编纂的“六便”“二长”“三弊”。他说:“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⑥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多有形而上学的特点,除了方志编修外,他较少从微观层面讨论史书编纂问题,但对于通史编纂,他却倾尽心力,立足“通史家风”,从宏观到微观,讨论通史编纂的利弊得失,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独树一帜。

在章学诚看来,通史有“六便”。所谓“免重复”,即通史叙事能够前后一贯,避免重复。尤其是

① 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卷3,《丙辰札记》,见《章学诚遗书》,第391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考摘录》,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58页。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37-238页。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考摘录》,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59页。

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考摘录》,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59页。

⑥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38-239页。

王朝交替之际,同一人物或史事,前代史书要记载,后朝史书也要记载,徒费笔墨,而通史上下贯穿,“事可互见,文无重出,不亦善乎”!所谓“均类例”,即通史较易统一全书体例。断代史中的《天官》《地理》《艺文》等志,名称不同,体例不一,渊源不明,但通史能“通前后而勒成一家,则例由义起,自就隐括”,一目了然。所谓“便铨配”,即通史便于统筹安排人物和史事。断代史在处理人物传记时,或按朝代,或按出生先后,或附传,或类传,不一而足,但通史可以根据作者的“别识心裁”处理人物关系,比如将屈原与贾谊同传等,“正有深意,相附而彰,义有独断”。所谓“平是非”,即通史有利于公允评价历史。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只有放到历史的长时段才可能有较为公允的评价,“惟事隔数代,而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所谓“去抵牾”,即通史有助于消除纪事矛盾。断代史记载一朝史事,“各有裁制,详略去取,亦不相妨”,但对横跨两朝之史事,记载往往出现抵牾,但通史“统合为编,庶几免此”。所谓“详邻事”,即通史可以完整记载周边各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四裔外国的历史发展,不可能与中原王朝同其始终,断代史所记周边民族历史,往往不能首尾俱全,而通史却能解决这一问题。章学诚所归纳的通史“六便”,展现了通史叙事的优势,是在梳理以往通史、断代史撰述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刻总结。

章学诚还归纳出通史的“二长”:“具剪裁”和“立家法”。此“二长”显示的是“通史家学”所必须具有的“一家之言”的境界。“具剪裁”意即通史能彰显史家笔削剪裁之功。章学诚认为通史“通合诸史”,可以用“一家绳尺”发凡起例、拾遗补缺、删落浮辞,文省前人、事详往牒。这是断代史、集史所无法做到的。“立家法”即通史以“成一家之言”为准的。章学诚指出,通史是在前代史书的基础上编纂而成,如果不能“立家法”,那么“陈编具在,何贵重事编摩”?所以通史编纂是“专门之业”,必须具有“卓识名理,独见别裁”,才能成就名山事业。章学诚的通史“二长”观,实际上是他重视“专门家学”“别识心裁”思想在通史编修中的具体体现。

章学诚虽然盛赞通史,但从来没有迷信通史,他指出通史有“三弊”:“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无短长”即通史容易流于纂辑之书。通史编纂如果只是依据前史比次资料,换换标题,内容无增损,没有“独断之学”,很易成为纂辑之书,无人问津。“仍原题”即通史编纂容易沿袭旧作。通史撰作如果沿袭旧作“品目”,不加更定,极易出现“去取失当”。“忘标目”即通史叙事内容丰富,涉及方方面面,很容易造成标目混乱。帝王、后妃、宗室等,按朝代标题,一目了然;列传没有标别,因史事而按叙次编排,也能自见朝代;但《独行》《方技》《文苑》《列女》等类传,按照一个体例将众多的人编在一起,无法看出其身处何世^①。章学诚所论通史“三弊”,表面看似似乎只是史书编纂的问题,但其背后却是“剿袭剽窃”“漫无家法”的问题。

总之,章学诚通过“判别家学”,比较了“通史”“断代”与“集史”的差异,指出三者“家法”不同,宗旨有别。“断代史”详尽记载一代历史,体例规整,有成法可依;“集史”包罗数朝,似通非通,似断非断,义例上与通史相似,而本质上与断代相通;“通史”除了时间上的贯通古今之外,更须“各出义例”,具有“别识心裁”,系统条理,删繁就简。通史叙述历史,有自身的优势,是断代史、集史所不能取代的。

三、“专家之学”与“别识心裁”:通史的境界

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对唐以后通史编纂的不断“堕落”表示了极度的不满。他说:“载笔汇而有通史,一变而流为史钞,再变而流为策士之括类,三变而流为兔园之摘比,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于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②所谓“史钞”,即“并无别裁”的贯通古今的节钞之书;所谓“策士之括类”,即“便于对策敷陈之用”的史书,如《文献通考》,“分析次比,实为类书之学,书无别识通裁”;所谓“兔园之摘比”,即《纲鉴和纂》之类浅近的书。这类貌似通史的著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38-240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38页。

述,因“师法失传”,没有“别识心裁”,与司马迁《史记》、郑樵《通志》等“法外之义例”“独具之心裁”的通史相比,失去了“通史”的原本意旨,结果成为史钞、括类、摘比之书,与通史之“本旨大原”愈离愈远。

唐以后通史编纂之所以出现“堕落”,关键是缺少了“专家之学”和“别识心裁”。在章学诚看来,史家必须具有“专家之学”和“别识心裁”,才能撰写出“能通天下之志”的理想通史。换言之,理想的通史是那些具有“专家之学”和“别识心裁”的通史,“专家之学”和“别识心裁”就是通史编纂的“本旨大原”。

章学诚乐谈“专家”,譬如“既为著作,自命专家,则列传去取,必有别识心裁,成其家言”^①，“学问专家,文章经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传”^②，“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③，《春秋》有口耳之受,马班有专家之学”^④,等等。章学诚所言“专家”,与今天分科治学背景下的“专家”含义不同。余英时认为,章学诚的“专家”有两层含义,一是“专家”相当于“成一家之言”,能成一家之言者即为专家;二是“专家”又与“约”之义相通,即能把握住学问之大体者为专家,与“尚博”而不能把握大体者不同。“实斋的‘专家’是对学问先具有一种大体的了解,并且逐渐从大处建立自己的‘一家之言’”^⑤。章益国在此基础上指出:“章学诚所谓‘专家’,实是‘专门家学’的省略语,是‘成一家之学’的‘专家’。”^⑥

章学诚贵专家之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一,“专家之学”有“统系”。章学诚认为“家学”既有自己显性的授受统系,还有一种内向而求的精神上的接续前人。所谓“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⑦,这是显性的“专门家学”的授受。就通史编纂而言,后人编纂通史,汲取前人经验,必须是“师法其意”^⑧,而非拘守成例,这是对前人作史精神的接续。可见,“专家之学”明显带有个性化学术传衍或学术流派特征,从而使公共的知识有了特殊的意义。其二,“专家之学”富有独见。章学诚认为,司马迁、班固有“专门家学”,但自唐以后,专门家学衰而史学绝,刘知幾、曾巩、郑樵生“史学废绝之后”,尚“能推古人大体”^⑨,其他都不值一提了。所谓“师法不立,学无专门,末俗支离,不知古人大体”^⑩。所以章氏言:“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⑪正因为史家有“专门之学”,所以才会出现同修一史而相互矛盾的现象,“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⑫。章学诚的“专家之学”,强调的是自成体系的“一家之言”。他认为,“诸史不难其事,而难其有以成一家之言”^⑬。其三,“专家之学”隐含性情意趣。章学诚给“专家之学”注入了一种个人性的“精神意趣”。他说:“专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传也。其可以言传者,则规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⑭又说:“专门家学,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必须口耳转授,非笔墨所能罄,马迁所谓藏名山而传之,必于其人。”^⑮所谓“神而明之”,“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不可以言传”等,是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五,《〈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95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六,《师说》,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35页。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19页。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五,《〈永清县志·阙访列传〉序例》,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83页。

⑤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5-76页。

⑥ 章益国:《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第383页。

⑦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六,《文集》,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19页。

⑧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2页。

⑨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四,《〈和州志·志隅〉自叙》,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87页。

⑩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四,《〈和州志·艺文书〉序例》,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14页。

⑪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49页。

⑫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中》,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7页。

⑬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六,《杂说》,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55页。

⑭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六,《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41页。

⑮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考释例》,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43页。

“功力”之外的一种“精神意趣”。章氏认为,史家治史,只有将“功力”和“精神意趣”相结合,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他说:“学贵专门,识须坚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至功力所施,须与精神意趣相为浹洽,所谓乐则能生,不乐则不生也。”^①对此,钱穆曾指出:“实斋论为学从人必本性情,而极其所至则以专家为归。”^②又说:“实斋论学,发乎性情,极乎通识。”^③也就是说,章学诚的“专家之学”从史家个人性情出发,施以功力,打通诸般关节,达于“通识”之境,成就“专家之业”。

章学诚论通史编纂,常将“专家之学”与“别识心裁”置放一起。所谓“纪传最古者,如马、班、陈氏,各有心裁家学,分篇命意,不可以常例拘牵”^④，“通史远自古初,及乎作者之世,别出心裁,成其家学”^⑤等。他特别看重“别识心裁”,声称“余著《文史通义》,不无别识心裁,不知者或相讥议”^⑥。也就是说,“专家”能否“成一家之言”,关键还在于他有无“别识心裁”。

当代多数史家都把“别识心裁”理解为独到的、不同流俗的见解。但也有一些史家持不同意见,比如倪德卫认为章学诚的“‘别识心裁’似乎是天才的明显标志”^⑦。余英时认为“别识心裁”是史家“一下子能够把握住大处的本领”,并“显然带有浓厚的直觉意味”^⑧。山口久和认为“实斋所说的‘别识心裁’可以理解为是和‘性灵’相同的东西……在客观知识活动的纵深之处,潜藏着隐含着考证学知识表面下的微妙之知,这种知虽然自己可以理解,但是要想用语言向别人传达的话,就很难了”^⑨。在他们看来,“别识心裁”是一种神妙的直接感悟和无法言传的主观判断力,源于史家自身的天性和禀赋。章益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从历史认识的“默会维度”指出“别识心裁”有“指向‘文字之外的默会传统’的含义”^⑩。这样的看法,丰富了人们对章学诚“别识心裁”的认识,为我们全面解读“别识心裁”提供了帮助。

章学诚讨论通史撰述,屡次使用“别识心裁”一词。细究其论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例上的“别识心裁”;二是史义上的“别识心裁”。

(一)体例上的“别识心裁”。章学诚的“别识心裁”尽管有天性、感悟的“意味”,但并非虚灵飘渺、不可捉摸的“神来之思”,而是有着具体的历史编纂学内容的“独断之思”。章学诚认为,“史无别识心裁,便如文案孔目”^⑪,由此他在《释通》《申郑》《答客问》等篇章中申述了通史编纂运用“别识心裁”的重要性。在章学诚看来,通史编纂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前人已有相关著述,或通史或断代,如何超越前人?只能靠“别识心裁”!也就是“即彼陈编,就我创制”^⑫。所谓“就我创制”,就是运以“别识心裁”,写出超越前人的通史。通史修纂如无“别识心裁”,“古人称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⑬!司马迁作《史记》,在体例上多有独创之处,所谓“创例发凡,卓见绝识”。“盖史迁创例,非不知纪传分篇,事多散著,特其书自成家,详略互见”^⑭。他在列传中把屈原与贾谊合传、老子与韩非合传,自见别裁,义有独断,“即楚之屈原,将汉之贾生同传;周之太史,偕韩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义有独断。末学肤受,岂得从而妄议耶”^⑮?凡此种种,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四》,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21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48页。

③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453页。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篇别录例议》,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27页。

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考摘录》,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59页。

⑥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8,《邵与桐别传》,见《章学诚遗书》,第177页。

⑦ 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1738—1801)》,第146页。

⑧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76页。

⑨ 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⑩ 章益国:《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第57页。

⑪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五,《〈永清县志·阙访列传〉序例》,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83页。

⑫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38页。

⑬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史余村》,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86页。

⑭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篇别录例议》,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27页。

⑮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39页。

得到章学诚高度评价。章学诚赞扬郑樵作《通志》“承通史家风”“所振在鸿纲”,其《二十略》“以史翼经,本非断代为书,可以递续不穷者比”,属于“专门绝业,汉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①。章学诚称赞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说该书“因事命篇,不为常格”,“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②,无非是因为该书不拘成法,具有“别识心裁”。

体例上的“别识心裁”要求作史要灵活变通,反对“拘守成法”,重视史体创新。章学诚认识到,史事变化万端,史书就应该适应叙事的需要,不断变化体例。他在《书教下》中说:“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迄自如,无一言或遗而或溢也。”纪传体行世一千多年,史家相承,没有更易,关键就是“书为体例所拘”,没有“别识心裁”,不懂随时变更,“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由此他提倡“通史撰述无定法”,“意之所在,必有别裁,或详人之所略,或弃人之所取,初无一成之法”^③，“折衷六艺,成一家言,往往以意命篇,不为常例”^④。唯其如此,才能编纂出“成一家之言”的通史。

(二)史义上的“别识心裁”。章学诚讨论通史编纂,常将“别识心裁”与“史义”联系在一起。他曾以人的身体来比喻史书所具有的事、文、义,所谓“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于人而言,“义”犹如人的精神,精神垮了,一切就完了。于史书而言,“义”就是史书的灵魂,没有灵魂的史书只是史料的堆砌。所以“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书必成家,而后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而行远”^⑤。“义”既然被比喻为人的精神,就有了一种难以准确表述的飘忽之感,“其义难以一言尽也”。而“别识心裁”也蕴含“性灵”“直觉”等精神要素,故而“义”在某种程度上与“别识心裁”相通。章学诚在《申郑》中直接将《春秋》的“史义”与郑樵的“别识心裁”放在一起讨论,他说:“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之所归乎?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然起而争之。”^⑥郑樵承袭《春秋》家学,运用“别识心裁”,在史事、史文之上求“义”。通过这样的论述,章学诚赋予了“别识心裁”以具体的思想内涵。

“别识心裁”蕴含经世致用之意。章学诚认为,“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⑦。他在《答客问上》中指出《春秋》“笔削大义”的终极指向是“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圣人通过《春秋》的“属辞比事”,表达对“天人”及“大道”的认识,彰显经世致用的思想。而这,也恰恰是“别识心裁”的形而上表达,是作史的“宗旨”,所谓“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史氏之宗旨也”^⑧。“别识心裁”既有“托之空言”之形上思考,又有“见诸行事”之形下考量,而其关键是“明道”,即通过“笔削独断”以“推明大道”。章学诚讨论史学问题,一方面强调“明道”。所谓“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发明道要,但叙学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义矣”^⑨。作史不能只叙述人物事迹,还要有“发明道要”;另一方面又强调“独断必凭事实”^⑩。所谓“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⑪。也就是要根据史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49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8页。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五,《〈亳州志·掌故〉例议下》,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05-1006页。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篇别录例议》,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29页。

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四,《方志立三书议》,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29页。

⑥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0页。

⑦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21-122页。

⑧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言公上》,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02页。

⑨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五,《〈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85页。

⑩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考释例》,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40页。

⑪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3页。

实阐发史义,“即器以明道”。章学诚指出,撰作通史,详近略远,是经世致用的具体表现,而尤以司马迁作《史记》为代表,“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太史公书》详于汉制……秦楚之际,下逮天汉,百余年间,人将一惟迁书是凭;迁于此而不详,后世何由考其事耶”^①。“通史家学”注重记载近当代史事,现实指向非常明显,这是古代通史撰作的优良传统。

总之,章学诚的“别识心裁”有“天分”与“直觉意味”的一面,但更有其实际的内涵,那就是史体上的不拘成法和史义上的经世致用,包含着对通史的形上思辩和形下安置。如果脱离了这些具体内涵,抽象的“别识心裁”就像国画中的留白脱离了国画的内容一样,必然变成毫无意义的妄想。

四、余论

“通”和“家”是认识章学诚“通史家风”及其通史思想的两个核心概念,缺一不可。

章学诚重“通”,他讨论“通史”问题,总是从“家学”“家法”出发来认识“通”。他倡导“《春秋》家学”,并由“家学”而引申出“家法”和“家风”,其“通史家风”与“《春秋》家学”是贯通的。从“《春秋》家学”到“通史家风”,其意义转换的核心是“家学”。章学诚的“通”,宗旨明确,是有“家学”、有“家法”的“通”,这种“通”不是量上的扩充,不是“泛骛以求通”,而是“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②。所谓“通史家风”,“家学”之意旨在前,“通史”之意旨在后。章学诚由“家学”而引申出“专家之学”“专门家学”“专门之业”“专门绝业”等,并将“史义”“别识心裁”与“一家之言”贯通,意在说明“通史”的旨趣自有其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传承。在章学诚笔下,“通史家风”既是通史的传统,更是承袭“《春秋》家学”,贯穿“史义”的撰作通史的方式。

章学诚重“家”,他讨论“家学”问题,总是从“通”的角度思考和推演。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论“《春秋》家学”,以“属辞比事”和“史义”贯穿始终,从司马迁、郑樵等通史撰述的宗旨考量“家学”的重要,即源达流,由流溯源,打通了经史间隔,疏通了由“《春秋》家学”到“通史家风”的关联和转换。在章学诚眼里,“专门家学”蕴含着通变意识,既有其主旨,又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注入新内容。章学诚以“通”之眼光看待“家学”,在“《春秋》笔削大义”的基础上阐发“别识心裁”的意蕴,引申出通史撰述中难以与外人道的“法外之意”,实际上就是以“通”之眼光考量“家学”演变。

要之,章学诚的“通史家风”,“通”主要来源于司马迁作《史记》的“通古今之变”,“家”主要来源于孔子作《春秋》的“《春秋》家学”。以“通”论“家”,“家”因“通”而明源流;以“家”衡“通”,“通”因“家”而分类例,这是章学诚通史思想的最大特点。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四,《记与戴东原论修志》,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85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通说为邱君题南乐官舍》,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95页。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and Zhang Xuecheng's Thoughts of General History

Wang Jilu

[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Zhang Xuecheng's "Tradition of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accurately, the two concepts of "Tong" and "Jia" are indispensable. In historiography, "Tong" contains two meanings: the history being regarded as a continuous process and all the materials

being gathered together to compile the history book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general knowledge” (通识) and “change” (变通) should be noticed. Centered on knowledge transition, “academic school” examines the changes of historical aims from royal academic transition to school which focused on study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ual, and then to the tradition of general history, and finally establishes the spiritu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ast two. Zhang Xuecheng also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of “general history”, “collecting history” and “dynastic history”, believing that the three have different purposes and methods, then he excluded the some ones from the general history. Zhang Xuecheng believed that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creating a new view” are the highest realm of general history writing, and the latter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the writing styles, but also in Chinese historical thoughts.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schools can be learned from general history, and the general history should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if we judge the historical issues according to academic schools,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Zhang Xuecheng’s general historical thoughts.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Zhang Xuecheng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academic schools general history

(责任编辑 汪高鑫)

(上接第 47 页)

Mirror and Flexibility: The Song Dynasty Scholar-officials’ Taking History as Guidance for Governance

Tian Zhiguang & Liang Jialing

[**Abstract**] Historical view is often used as a theoretical source for Song Dynasty scholar-officials to govern the government, and provides an ideological basis for their political ideas. Specifically, they hoped the emperors had the merits of the former wise emperor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ideal of assisting the “sage-king”; learning previous measures to govern the people, based on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 to maintain social order in times of famine and turmoil; in the handling of ethnic relations, they actively sought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terpret the spirit of Chan Yuan to replace force with moral indoctrination, avoiding conflict. In addition, scholar-officials reflected on history in response to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imes, elite of scholar-officials rely o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or events to achieve certain political goals. In summary, historical view can be flexibl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ircumstance to adapt to th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political life and play a better mirror role in realpolitik.

[**Key words**] The Song Dynasty scholar-officials historical views taking history as guidance for soci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汪高鑫)